

主题研究: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走向与变革

# 元代书院与程朱理学的传播

李 兵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 湖南 长沙 410082)

**[摘 要]** 元代建立之后,南宋遗民将书院作为研究与传播程朱理学的基地,以捍卫其作为“道统”维护者的尊严。在官方支持下,程朱理学以书院为依托实现了北传,不但将程朱理学的影响成功地向北方广大地区扩展,而且也使蒙古贵族对其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随后,程朱理学被统治者提升为官方哲学,并规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在学习程朱理学与科举应试相统一的思想指导下,元代书院的教学成为程朱理学传播与普及最重要的途径。

**[关键词]** 元代书院;程朱理学;传播;科举

**[中图分类号]** G649.29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7)01-0138-06

##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cademies of Classical Learning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Yuan Dynasty

LI Bing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Yuan Dynasty was founded, the adherents of the preceding Song Dynasty made ancient academies of classical learning the important base to study and disseminate neo-Confucianism in order to retain their dignity of Confucian orthodoxy. Moreover, the base served to disseminate neo-Confucianism in north China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Yuan regime, while Mongolian aristocrats ha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it. Later, neo-Confucianism was upgraded to official philosophy by the ruling class, which made it a rule that neo-Confucianism should be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unific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and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s, teaching in the academies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way through which to disseminate and popularize neo-Confucianism.

**Key words:** academies of classical learning in the Yuan Dynasty; neo-Confucianism; dissemination;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s

元代统治者以武力征服中原之后,安抚汉族士人,进而实现对全国的思想控制成为他们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而程朱理学已经被南方士人普遍认同,并发展成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这为程朱理

**[收稿日期]** 2006-05-30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4YB050)

**[作者简介]** 李兵(1971-),男,湖南浏阳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研究员,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书院史及中国科举史研究。

学上升为官方哲学提供了可能。然而,程朱理学要真正实现这种转化,还面临着两个问题:其一,在维持程朱理学作为南方地区主流思想地位的同时,如何将其影响从南方扩展到元代政治中心所在地的北方地区,并尽可能地让统治阶层认同其存在的必要性;其二,在程朱理学上升为官方哲学之后,统治者应通过何种手段进一步扩大其影响,从而能让范围更广的普通民众接受这种官方哲学。在解决这两个难题的过程中,元代书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它不但成为程朱理学北传的重要载体,而且通过开展科举教学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的地位。

## 一、书院是南宋遗民宣讲程朱理学之所

元朝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使宋代士人经受着双重的心灵拷问:一是赵宋王朝的覆亡使士人普遍有亡朝之痛;二是“异族”的蒙古民族入主中原,使得历来注重“道统”的士人失去了原有的尊严。为维系程朱理学家所阐扬的“道统”,南宋遗民将研习和传播程朱理学作为其人生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大多数南宋遗民与其先辈一样,将书院作为研究与传播程朱理学的重要基地。人称“江汉先生”的赵复主讲太极书院时,主要讲述程朱理学的精华——“道统论”,他认为:“周、程而后,其书广博,学者未能贯通,乃原羲、农、尧、舜所以继天立极,孔子、颜、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张、朱所以发明绍续者,作《传道图》,而以书目条列于后”<sup>[1]卷九,2994</sup>。另一位遗民胡炳文的家学源于朱熹,“笃志家学,又潜心朱子之学,上溯伊洛,以达洙泗渊源,靡不推究”<sup>[1]卷八九,2986</sup>。他先后主讲信州道一、明经等书院,专门讲授程朱理学。在他的努力下,出现了“儒风之盛甲东南”的盛况<sup>[1]卷八九,2986</sup>。熊禾从学于朱熹门人辅广,虽登咸淳十年(1274)进士,但入元不仕,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修建、讲学书院的活动中,以图扩大程朱理学的影响范围。据《宋元学案》载,他曾讲学于武夷书院,修建洪源书堂、鳌峰书堂并讲学其中,从者甚众。这些有着程朱理学知识背景南宋遗民成为元代书院讲学的主力军,他们的书院讲学活动不仅使得南宋遗民在一定程度上重拾了原有的尊严,而且使程朱理学在思想领域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不少以研究与传播程朱理学闻名的南宋书院得以修复,为南宋遗民的学术活动提供了更加稳固的基地,如白鹭洲书院、岳麓书院、淮海书院、月泉书院、慈湖书院、道州书院、濂溪书院等。有些地方修复书院的活动还相当活跃。黄在《重修月泉书院记》中描述了浙江地区修复书院的盛况:“窃观在昔郡县之未有学之时,天下唯四书院,其在大江以南潭之岳麓、南康之白鹿洞而已,三吴百粤所无有也。今郡县悉得建学,而环江浙四封之内,前贤遗迹名山胜地为书院者,其多至八十有四,好事之家慕效而创为之,未见其止也。”<sup>[2]15</sup>各地修复书院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与传播程朱理学,如广西宣城书院祀奉理学大师张与吕祖谦,至元二年(1265)修复以后,书院主持者为达到“道不可泯”的目的,要求生徒“读其书,释其旨,汲汲焉,拳拳焉,勉其如宣成者,去其不如宣成者,则沿张吕、溯濂溪、接洙泗,使圣道之明千万世如日”。

为更加凸现朱熹在创发和传播程朱理学方面的贡献,在朱熹的祖籍所在地修建书院成为理学家和地方官吏的共识。欧阳玄说:“今州县学校则必专祠先圣先师,于是国家秩诸祀典。若夫书院则又多为先贤之祠,或其过化之邦,或其讲道之地,如是者不一也。”<sup>[3]134</sup>朱熹的祖籍所在地徽州有直接以朱子的室名、别号命名的紫阳书院和晦庵书院。方回在《徽州重建紫阳书院记》中说明了重建书院并命名为紫阳的原因:“紫阳山去古歙郡之南门五里而近,故待制侍讲赠太师徽国文公朱先生郡人也,合山与人,称曰紫阳夫子,若洙泗先圣然,此书院之所以作,而名之曰紫阳也。”<sup>[4]1398</sup>至元二十六年(1289),在地方官吏和乡绅的共同努力下,于朱熹的故居婺源修建了晦庵书院,“聚其乡人

详见蔡呈韶《重修宣城书院记》,载《临桂县志》卷一四,《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本,成文出版社1974年版,第256页。

子弟以时修习礼教于其中<sup>[5]329</sup>。

不仅如此,朱熹曾经生活、任官和讲学过的福建、江西、浙江、湖南等地也出现了相当数量的为纪念他而创建或修复的书院<sup>[6]168-173</sup>,这些书院不仅讲朱子之学,而且在规制上也纷纷效仿程朱理学的大本营白鹿洞书院。在这些地区之中,又以朱熹出生、任官、讲学以及终老之地——福建最盛。虞集说:“国家奄有四海,郡县无大小远迩,莫不建学立师。乃若先贤讲学故地,遗迹所在,及贤士大夫好善乐道者,或因或创,为之书院。其以文公而有所创立者甚众,而七闽为甚。”其中朱熹出生和讲学所在地建阳有七所,皆由朱子门人及信奉者所立,分别是考亭书院、庐峰书院、同文书院、化龙书院、鳌峰书院、云谷书院、环峰书院。此外,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尊崇程朱理学的书院,对程朱理学的传播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南宋遗民以书院为依托宣讲程朱理学,不仅扩大了程朱理学在南方地区的影响,也让蒙古统治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程朱理学与士人之间的密切关联,从而使急于想笼络南宋遗民者不得不正视程朱理学,这为程朱理学上升为官方哲学奠定了坚实的认识基础。

## 二、书院是程朱理学北传的主要载体

当程朱理学在南方地区大范围传播时,忙于征战的元世祖忽必烈接受尊孔崇儒的建议,采取武力征伐与文化掠夺并用的政策,即通过武力征伐俘虏南宋士人、掠夺汉人书籍等手段,达到为其所用的目的。元军在攻取湖北时,不仅“屠德安”,而且还实施了相当严酷的文化掠夺,“凡儒、道、释、医、卜占一艺者,活之以归<sup>[1]卷九,2994</sup>”。其中人称江汉先生的赵复也在其中。元代另一位大儒许衡在灭金的前一年也为元军游骑所得,成为元代“朱子之后一人”。在书籍及文献方面,中书省事杨惟中依靠武力在四川、湖广、浙江等地大肆掠夺文化资源,《宋元学案》载:“时濂溪周子之学未至河朔,杨惟中用师于蜀、湖、京、汉,收集伊洛诸书,载送京师<sup>[1]卷九,3003</sup>”。这种文化掠夺虽然对南方文化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但却为程朱理学的北传提供了良好的人才储备和物质条件。

在此基础上,蒙元统治者建立了首所书院——太极书院,使其成为程朱理学北传的大本营。元太宗七年(1235),中书省事杨惟中、姚枢在燕京创建太极书院,延请赵复为主讲。书院以程朱理学开创者周敦颐所提倡的“太极”命名,直接向世人表明其宗旨是传播程朱理学<sup>[7]34</sup>。与此相应,书院的教学内容也以程朱理学为主,其中尤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重。北方的著名学者如许衡、窦默、姚枢、刘因、梁枢、赵或等人皆为赵复主讲太极书院时的高足,他们学成之后成为北方地区利用书院传播程朱理学的中坚力量,其中许衡曾主持陕西西安正学书院教事,刘因主讲静修书院达二十余年,姚枢则退隐苏门讲学。由此可见,在程朱理学北传的过程中,太极书院确实发挥了主导作用。黄百家对太极书院在传播理学方面的功绩有相当高的评价:“自赵江汉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由是北方之学郁起,如吴澄之经学,姚燧之文学,指不胜屈,皆彬彬郁郁矣。<sup>[1]卷九,2995</sup>”

正是在这些学者的大力推动下,北方地区出现了创建、讲学书院的热潮。笔者根据《宋元学案》和《元史》的相关资料,统计了60位宋末元初和元代著名学者的活动,他们修复、创建和讲学的书院达49所,有学者统计,元代书院的数量为406所<sup>[8]37</sup>。也就是说,《宋元学案》和《元史》中有传的学者所执掌的书院占元代整个书院的12%。更何况在《宋元学案》、《元史》记载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著名学者也利用书院传播程朱之学,且生徒数量众多。如至元年间,翁森在浙江安仙建安洲书院授徒讲学,生徒达八百人。著名学者程瑁主讲陕西三原学古书院时,“启迪渐有成序,部使者上之

详见吴宜燮《龙溪县志·艺文》,《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本,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358页。

详见《台州府志·学校略下》,《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本,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875页。

朝,报下旌其门<sup>[9]389</sup>,从游者百余人。这些以讲学为主的书院不仅广泛分布于南方的浙江、江西、安徽、江苏、湖南、福建等省,而且在原来书院极少的直隶、陕西、河北等省也有了一定的数量。笔者根据曹松叶先生的统计,将宋元两代黄河、长江、珠江流域书院的分布统计列表如下:

表1 宋元两代黄河、长江、珠江流域书院分布比较表

地域	宋代		元代	
	书院数(个)	百分比(%)	书院数(个)	百分比(%)
黄河流域	13	3.26	43	18.94
长江流域	297	74.44	152	66.96
珠江流域	89	22.30	32	14.10

资料来源:曹松叶《宋元明清书院概况》,《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929年第10集,第111期第7-11页,第112期第14-18页。

表1表明,元代黄河流域书院的数量已有大幅度增加,不仅超过珠江流域的书院总数,而且与长江流域书院数量的差距也明显缩小。由于有相当数量的书院是以传播程朱理学为主要职能,因而随着北方书院数量的增加,程朱理学在北方地区的传播也日渐广泛,有学者认为,在书院学者的努力下,“最终实现了理学的北移<sup>[10]223</sup>。可见,书院向北方推广与程朱理学北传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程朱理学的传播促进了元代书院的发展,为其向北拓展提供了契机;而书院的拓展又有力地推动了程朱理学在北方地区的传播。程朱理学的北传不但提高了北方地区的文化水平,更重要的是将原来在南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程朱理学向元代的统治中心推广。赵模在《考亭书院记》中描述了程朱理学的普及程度:“而天下之学,皆朱子之书。书之所行,教之所行也;教之所行,道之所行也。”

在书院的积极推动下,程朱理学不但获得了士人的普遍认同,而且为统治者所青睐,将其提升为官方哲学也就势在必行了。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正式恢复科举取士时,将程朱理学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元史》载:“蒙古人、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词典雅者为中选……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sup>[11]2019</sup>由于科举考试完全由政府主导,因此将程朱理学纳入科举考试的命题范围,清楚地表明程朱理学被正式提升为官方哲学了。

### 三、书院科举教学加速了程朱理学的传播

在上升为官方哲学之后,程朱理学成为官学、书院和私学等各类教育机构的教学内容,其传播途径因此进一步拓宽。而当时官学化倾向非常明显的书院更是将程朱理学的教学与科举考试紧密结合,使其传播程朱理学的职能更加突出。笔者在此以元代最能体现书院教学活动的史料——程端礼所著《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以下简称《读书分年日程》)为例来进行分析。

《读书分年日程》的制定者程端礼为元代大儒史蒙斋的门人,先后担任建平、建德两县教谕和稼轩、江东两书院山长等教职。他一生以讲学为主,其教育思想的形成主要是在讲学书院期间。程端礼认为,课程教学计划的制定是培养科举人才的重要保证,因而制定了《读书分年日程》,“由于它集中体现了书院读书讲学的精神,所以一直被书院教学所采用<sup>[12]504</sup>。《读书分年日程》的制定综合了朱熹的《朱子读书法》、《学校贡举私议》、《白鹿洞书院教条》、《程董二先生学则》、《西山真先生教子斋规》

详见赵模《考亭书院记》,载《建阳县志》卷八,《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本,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875页。

以及《果斋训语》等程朱理学家的教育教学成果,可以说是宋元书院教育思想的结晶。

作为程朱理学的传人,程端礼对元代取士以程朱理学为命题内容的做法相当赞同,认为这样可以使理学和举业统一起来,以选拔更多精通报朱之学者。他说:“今制取士,以德行为首,经术为先,词章次之,盖因之也。况今明经,一主朱子说,使理学与举业毕贯于一,以便志道之士,汉、唐、宋科目所未有也。”<sup>[13]序,1</sup>但在他看来,大多数读书应举的士人并未真正掌握博大精深的程朱理学,甚至将其视为猎取科举功名的工具。他说:“今士之读经,虽知主朱子说,不知读之固自有法也。读之无法,故犹不免以语言文字求之,而为程序资也。”于是,他“不自揆,用敢辑为《读书分年日程》”<sup>[13]序,1</sup>。由此可见,《读书分年日程》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培养能真正领悟和传播程朱理学的人才。

为使生徒有扎实的程朱理学功底,并真正掌握其精髓,程端礼依照朱熹的读书思想,为生徒制定了分阶段学习的教学计划。《读书分年日程》将书院生徒的学习分为“八岁未入学之前”、“自八岁入学之后”和“自十五志学之年”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规定了必读之书和读书次序。程端礼开列的书目基本上都是朱子的《学校贡举私议》所提及的必读之书,以及朱子所读之书和程朱后学的著作。八岁未入学之前,要求生徒读《性理字训》。他说:“此乃朱子以孙芝老《能言》作《性理》、《绝句》、《百首》教之之意”<sup>[13]卷一,28</sup>,而不是学习当时蒙学的通用教材《蒙求》和《千字文》。八岁入学之后,用六七年的时间学习《四书》、《五经》的正文。而生徒自十五岁开始,需要用三四年的时间来潜心学习程朱理学的经典著作,以掌握真正的“为己之实学”,不能抱有丝毫的功利目的,这既是生徒“终身之大本”<sup>[13]卷一,44</sup>的依靠,也是科举考试作文之根本。

在此基础上,程端礼认为生徒可以看史读文,其次序是先读《资治通鉴》,“次读韩文,次读离骚”<sup>[13]卷二,50-52</sup>,然后开始学作科举时文。他借鉴南宋理学家真德秀《教子斋规》的作文之法提出了“作科举文字之法”:<sup>[13]卷二,67-68</sup>“读看近经问文字九日,作一日。读看近经义文字九日,作一日。读看古赋九日,作一日。读看制诰表章九日,作一日。读看策九日,作一日。”<sup>[13]卷二,67-68</sup>他认为,通过两三年的时文写作学习之后,就已经具备参加科举考试的能力了。

从《读书分年日程》所强调的理学与举业贯一的思想来看,程端礼十分强调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读书明理,以尽可能地掌握程朱理学的精髓,即他所说的“大本”。他认为掌握程朱理学是科举应试的基础,举业文章只是掌握了程朱理学之后的自然流露。他说:“大抵作文办料识格,在于平日(此用剡原戴氏法)。及作文之日,得题即放胆(此用迭山谢氏法)。立定主意,便布置间架。以平日所见,一笔扫就,却旋改可也。”<sup>[13]卷二,68</sup>正是由于对程朱理学的重视,他不赞同士人过早学习写作举业文章,《读书分年日程》规定必须在依次读完三个阶段的书之后,才能开始学习举业作文,如此“既有学识,又知文体,何文不可作!”<sup>[13]卷二,53</sup>并对不少人让子弟从小学习举业文章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对于学习时文和程朱理学,程端礼强调后者是根本。因此,他坚持生徒要将大量时间和精力用在学习儒家经典和程朱理学的著作上,而对于科举时文则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他说:“作举业时,虽不能不看时文,只当将数十篇看其规矩格式,不必将十分全力尽用于此。若读经、古文,此是根本工夫。根本工夫有得,时文亦自然长进。”<sup>[13]附录,178</sup>他认为,不仅生徒在二十一二岁或二十四五岁前不要学习举业文字,即使已经进入开始学习写作时文的阶段,还是要将大量的时间用来温习以前所读的程朱理学经典和文学著作。他要求“仍以每日早饭前,倍温四书《经》、《注》、《或问》,本经传、注、诸经正文,温史。夜间考索制度书,温看性理之书”<sup>[13]卷二,68</sup>。《读书分年日程》规定读经和写作时间的比例大概为 9 : 1,以便生徒能在学习过程中恰当地分配学习程朱理学和应试知识的时间。

实际上,《读书分年日程》强调通过书院的“植大本”——程朱理学的教学,使生徒同时掌握程朱理学和科举及第所需知识,从而将其培养成既精通程朱理学的学者,又符合朝廷要求的科举人才。这种教学方式既符合统治者的意图,也能为广大士人所接受,因而有利于程朱理学向范围更加广泛的士人阶层传播。尽管由于元代科举实行的时间较短,而且《读书分年日程》是在元代中后期才提

出的,其中的种种设想并未在书院教学中得到完全实施,但它从理论上提出了书院在继续传播程朱理学的同时,如何满足生徒获取应试知识需要的办法,为明清书院开展科举教学提供了理论支持。

元代统治者为了稳固政治统治,在允许南方士人继续利用书院传播程朱之学的同时,支持精通程朱理学的学者在北方大力宣讲,使其在政治统治中心得以广泛传播,这为程朱理学上升为官方哲学创造了厚实的思想基础。程朱理学成为科举考试内容之后,在以《读书分年日程》为代表的教学理论的指导下,元代书院在教学过程中强调程朱理学是科举应试的知识基础,鼓励生徒通过潜心学习程朱理学之后实现科举入仕的梦想。书院的这种教学方式不仅有利于拓展程朱理学的传播范围,而且能进一步提高其传播的实际效果。

### [参 考 文 献]

- [1] 黄宗羲. 宋元学案·鲁斋学案[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Huang Zongxi. Major Schools of Song and Yuan Confucians, Luzhai Schools[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 [2] 黄 重. 重修月泉书院记[A]. 黄 . 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一四[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四部丛刊》初编本,1989. [Huang Jin. The Record of Repairs Yuequan Academy[A]. Huang Jin. Huang Jin's Collected Works: Vol. 14[M]. Shanghai: Shanghai Shudian Publishing House, 1989.]
- [3] 欧阳玄. 贞文书院记[A]. 欧阳玄. 圭斋文集:卷五[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1987. [Ouyang Xuan. The Record of Zhenwen Academy[A]. Ouyang Xuan. Ouyang Xuan's Collected Works: Vol. 5[M].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7.]
- [4] 方回. 徽州重建紫阳书院记[A]. 方回. 桐江集:卷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续修四库全书》本,2002. [Fang Hui. The Record of Repairs Ziyang Academy in Huizhou[A]. Fang Hui. The Works of Tongjiang: Vol. 2[M].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5] 柳贯. 晦庵书院记[A]. 陈谷嘉,邓洪波. 中国书院史资料:上册[C].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329. [Liu Guan. The Record of Hui'an Academy[A]. Chen Gujia, Deng Hongbo. Zhongguo Shuyuan Shi Ziliao( ) [C]. Hangzhou: Zhejiang Education Press, 1998. 329.]
- [6] 徐梓. 元代书院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Xu Zi. Studies on Academies in Yuan Dynasty[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s Publishing House, 2000.]
- [7] 孙建平. 赵复和太极书院对元代理学发展的促进作用[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32-35. [Sun Jianping. Zhao Fu and Taiji Academy's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ism in Yuan Dynasty[J].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005, (3): 32-35.]
- [8] 白新良. 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M].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 [Bai Xinliang. History of Development of Academy in Ancient China[M]. Tianjin: Tianjin UP, 1995.]
- [9] 萧 欽. 学古书院记[M]. 萧 欽. 勤斋集:卷五七[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1987. [Xiao Ju. The Works of Xuegu Academy[M]. Xiao Ju. Qinzhai Ji: Vol. 57[M].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7.]
- [10] 邓洪波. 中国书院史[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 [Deng Hongbo. A History of Chinese Ancient Academy[M]. Shanghai: Oriental Publishing Service Co., Ltd, 2004.]
- [11] 宋濂. 元史·选举志一[M]. 北京:中华书局,1997. [Song Lian. The History of Yuan[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7.]
- [12] 李国钧. 中国书院史[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Li Guojun. A History of Chinese Ancient Academy[M]. Changsha: Hunan Education Press, 1998.]
- [13] 程端礼. 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M]. 合肥:黄山书社,1992. [Cheng Duanli. A Daily Study Schedule of Cheng's Family School Graded by Age[M]. Hefei: Huang Shan Press, 1992.]